

文庫博物館專集（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增刊 第九十三期 ——
(一九九六年七月七日出版)

1. **【综合报导】** 浴火重生之旅——从幻灭到希望 《亚洲周刊》
2. **【研究动态】** 不能反思灾难的民族是无望的 张伟国
3. **【自由论坛】** 也谈“文革” 赵淮海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浴火重生之旅
——从幻灭到希望

在文革三十周年之际，中国大陆主要报刊都对文革避之唯恐不及。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作出定义：“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但令人不解的是，如今在中国大陆，有关文革的研究和报导仍是一个无形的禁区。

◎ 对文革为何讳莫如深？

文革后的十多年里，在中国大陆掌舵的，都是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一辈领导人。接班的第三代领导人也都经过文革历练，其中不少人也吃尽苦头，对文革中的造反派至今仍耿耿于怀。他们为什么却对文革讳莫如深？

毛泽东一手造成的这场灾难，使中共的执政地位受到震荡。当局担心再纠缠文革问题，会全盘否定毛泽东，从而有损中共形象。目前，中共大陆的经济正面临严峻的形势，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失业大军在继续扩大。各地治安越来越坏，当局正发动空前规模的严打运动（见本刊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二日号）。在这种情况下，“稳定高于一切”，议论文革三十周年遂成为禁区。而从“六四”事件以来，五月又一直是敏感时期，宣传出版部门对政治话题控制尤严。

北京《青年报刊世界》本来有个关于文革的栏目“激活自己的记忆”，九六年五月五日被新闻出版署责令取消。辽宁《当代工人》杂志发表了上海作家叶永烈撰写的有关“五·一六”的文章。刊出才几天，北京的新闻出版署便责成辽宁省新闻出版局，要求该刊作检查。有关编辑找到叶永烈，叶觉得奇怪，这篇文章只是依据早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陈伯达传》几个章节改写的。叶递交了当年的审查批件，新闻出版署才不再追究。

◎ 毛林交易打倒罗瑞卿？

中央党校的金春明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九五年九月出版，今年五月初便被新闻出版署下令禁止发行。一些专家认为，该书在史实和观点上并没有重大突破，但第一百一十五页上那句“可以认为打倒罗瑞卿是林彪同毛泽东的一笔政治交易”却引起广泛注意。

二百万字的《文化大革命大辞典》由徐向前元帅生前题写书名，三年前就签发了出书合同。校样送至新闻出版署审阅，新闻出版署又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代审。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丁关根表示，此辞典绝对不许出版，中央党史研究室也就再没审阅，书稿至今仍存放该室。

该书副主编王年一对亚洲周刊说：“这部辞典我整整编了十年。许多作者自费外出调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就说广西一带究竟有没有人吃人，我们找到了事实，要有根据才能写。”

《文化大革命史》书稿在四川人民出版社放了两年，至今仍出版无门。说要送审，又不知道该送给谁审，这个部门推那个部门，谁也不拍板定夺。多人合作的《文化大革命通史》也没能出版，有作者找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答复是，不赞成出版这类书，书稿拿回去吧。由近二十位名人写的二十万字《文革一日》在北京转了多家出版社，谁也不敢出版，书稿至今搁着。反映一代人悲剧的洋洋二十万言《红卫兵与文化大革命运动》早已写成，也未能付梓。

《邓小平的三上三下》由海南出版社出版，三位作者分别是国防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年轻人。据说，该书因详细披露邓小平致毛泽东的“我永不翻案”那封信，受官方追究。国防大学的作者被迫转业，另两位作者受刑事处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军队》由新华出版社出版，聂荣臻元帅题写书名，书中披露了文革中军队的调动和武器情况。两名作者是军事科学院的，都因“泄密”受处分。上海中共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党史信息报》，上月披露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将在今年举办一次文革研讨会。有人反映，文革三十年了，文革的所在地中国

竟然无声无息，太不象话。于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举行了一次小范围研讨活动。

◎ 浴火重生的转折点

文革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神州“浴火重生”的转折点：没有毛泽东的文革灾难，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文革的恐怖和荒诞，反过来使中华民族恢复了思考的能力，冲决自我封闭和政治教条的禁锢，向现代世界文明敞开怀抱。

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共党史学教授王年一是一大陆“文革学”主要学者之一，他所著的《大动乱的年代》资料详实，分析严谨。他说，如果没有文革，中国大陆的改革不可能来得这么快，没有文革，就没有历史大转弯，这也许是文革的“历史意义”吧。“我听说北京有个大学生贴出大字报，主张再搞一次文革。他根本就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人，也不能说没有。”

他说，文革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把我们的失误、弊病、缺点、弱点发展到极端，暴露得淋漓尽致，许多假、丑、恶现象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它的千错万错教育了人们。而今还不能说文革的余毒已彻底清算了，我们的民族正出现许多无理想、无信仰、无道德、无是非的“痞子人”，而政治体制改革也大大滞后。

◎ 中华民族出现痞子人

最早呼吁建立“文革学”的诗人邵燕祥对亚洲周刊说，文革是一场大灾难，不是粉碎了“四人帮”就什么都结束了。这场灾难反映出的体制和国民性问题，都值得我们认真思索。他谈起最近出版的《希特勒青年团骨干忏悔录》一书，书中披露了一九四五年几个纳粹党青年团骨干的心路历程。一场浩劫过去了，青春和理想不再为罪恶陪葬。他说，这对中国现实有深刻的参照意义。

文革还会不会再来呢？广州中山大学理论部博士郭文亮认为，有可能再来一次。文革产生的错误影响和遗产，并未完全消除；文革发生的社会条件和群众基础并未根本改变。八九年“六四”风波之后，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党内左倾思潮抬头，就是文革可能再次发生的证明。在北京，不少人认为最近出现的两份论述影响国家安全因素的“万言书”，就是文革余毒的延续。

不少人认为不应简单地全盘否定文革。当年北京清华大学学生组织一位核心人物，现在是一家外贸企业的负责人。他认为，文革是不能全盘否定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么多人卷入，不可能用简单的原因来解释。他说，对蒋介石、毛泽东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全部肯定或否定，对文革同样如此。

他说：“文革对中国造成的最大损害，是严重挫伤了中华民族的脊梁骨，不管是整人的还是被整的，都把自信心丧失干净。从今天中国社会中的许多现象，以及中国人到外国后的表现，都可以看到‘失去人格’的后遗症。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还只能实行由共产党来‘管’老百姓这一套，这也是文革的后果。”

他认为，从好的方面来看，文革使中国人从“梦”中“醒”过来，不再相信什么“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之类的伟大理想，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重新产生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

◎ 评价文革仍有分歧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还出版了一本《文革中的我》。他说，关于文革在中国当代史上的“意义”，绝大多数中国人早已有共识，党中央也作了决议。与大多数人

作对的人还是有的，不过很少很少。

王东成文革时是吉林省浑江市（现白山市）第二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当过造反派负责人，还当过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他强调说，我们这一代人再也不能陷在“文化大革命情结”中欣赏当年的“悲壮”，沾沾自喜于劫后的“辉煌”。若以此篡改记忆与历史，是又一次犯错误。

不少人仍在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能发动亿万群众真心诚意参加，而且还在全世界造成那么大的影响，这不是“内乱”的定义可以说清楚的。发动文革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十年之间经历的曲折复杂历程留下哪些沉痛教训，这些都有待深入探讨。

虽然当局下达了许多禁令，不少人不愿也无暇提及那段历史，但仍有一些学者和作家坚持研究和写作，一些出版社出版了一些文革纪实文学作品，一些刊物也勇于刊载文革三十年祭的文章。江苏的《东方》、北京的《华声月报》、上海的《上海滩》、深圳的《焦点》都推出有关文革的专题文章。山东《青年思想家》在山东莱阳市举办了一次为期两天的文革研讨会，二十位学者与会。

◎ 中年是研究主力

该刊主编贺立华对亚洲周刊说，这次研讨会以“十年文革与十年改革”为题。文革今天还有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尚未结束。改革中遇到的许多问题都能从文革中找到它的病根，象专制集权、一言堂、形式主义至今还大有市场。一说搞开发区，全国遍地开花，文革研究不透彻，改革就不可能深入推进。

在中国大陆，“文革学”研究者主要有四部分人。一批是正统的中共党史学家。他们身在中央所属的机构任职，其中有中央党校、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和周恩来组、军委领导下的国防大学、邓力群主持下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他们主要依照中共的《决议》精神开展研究，容易接触到高层档案资料。其中以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中央党史研究室文革组郑谦、中央党校金春明为代表人物。金是中国大陆唯一指导中共党史专业文革课题的博士生导师。

一批中青年学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印红标等，是目前研究文革的主力。他们大都在业余时间涉及文革领域，往往偏重于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和社会现象。他们对文革有个人体验，一旦欠缺资料，就凭记忆或推论去丰富，但这也往往成了他们的弱点。他们的经历可能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容易带上感情色彩。

◎ 拷问灵魂的反省

徐克滇在文革开始时是四川省成都第一中学高三学生。他说，回想往事觉得挺可笑，但当时是很激动人心的，有一种新鲜感，更多的是幸福感、神圣感、历史感。文革后他作了深刻反思。他曾把红卫兵运动比作青年纳粹运动，引起不少人的愤慨和抗议。他说，“历史就是无情无私的记忆，加上敢于拷问灵魂的反省。”他目前正致力于文革和红卫兵历史，跑了许多城市，采访各种人，深深感到不少人已有意无意地忘记过去。他想与同代人共同努力，以回忆和反省复员那一段历史，他希望这一代人能够激活自己的记忆，趁为时不算太晚抢救这一段历史。

北京大学的印红标也偏重于对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研究，近年采访了显赫一时的红卫兵领袖，录下了一百多小时的谈话录音，先后发表《红卫兵运动的两大潮流》等论文。最近，他申请北京社会科学院九五规划研究基金，出乎意料，竟然可望成

功。他说：“我们的研究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料困难，发表困难，资金困难，交流困难，但文革学毕竟在中国含苞欲放了。”

◎ 趁早抢救文革史

上海大学的朱学勤致力研究文革中的知识青年思潮。他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一文中提出了“六八年人”的概念，即六八年前后的上海高中学生，与现在文艺作品中的红卫兵不一样，不是打砸抢一类。他们较早产生对文革的怀疑，由此又启动思考发展成青年学生中一种半公开、半地下的民间思潮，他称之为“思想型红卫兵”即“六八年人”。“六八年人”及其现象在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过，被后人忽略和遗忘了。朱的文章在思想学术界引起反响。

还有一批学者是以研究文革时期的文艺事件和文革现象为突破点。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副教授杨健九三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九五年，学者戴嘉枋出版了《样板戏的风风雨雨》。

“文革纪实文学”拥有广泛的读者。上海作家叶永烈接连推出《江青传》、《姚文元传》、《张春桥传》、《王洪文传》、《陈伯达传》。天津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表现普通人的文革经历。此外，林青山关于林彪、康生的两部“外传”，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等，都描述了文革时期的人文心态。不过，目前流行于市的不少纪实文学作品只是东抄西编的大杂烩。

◎ 文革学要求诸野？

中国大陆文革学研究者目前正面对外国文革学研究者 and 海外中国学人两支劲旅的挑战。学者徐光漫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出现在外国。此话固然令人不快，但应引起我们的深思。”徐说，二三十年来，西方学者从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济学、文化学方面写出大量专著和论文，其中虽然有的给人隔靴搔痒之感，有的议论令人忍俊不禁，但仍有不少真知灼见。尤其是看问题角度之广、思维之活、搜集求证功夫之深、争辩诘驳态度之严肃，都给人深刻印象。

不少人认为，理论功力不足，是目前中国大陆文革学研究者明显的缺陷，但资料的丰富又是海外学者难以匹敌的。不过，由于大批资料和档案尚未开放，中国许多潜在的优势并未发挥。研究了二三十年，外国学者几乎用尽手头的资料，新资料又一时难以发掘。不少以文革学起家的外国学者已转向研究中国的现实，这给中国大陆的研究者迎头赶上的机会。

文革结束二十年了，文革的余音和残骸依然时有所闻，时有所见。上海控江路一家百货公司六楼有一幅楷书中堂，赫然写着“文化大革命”五个字，堂堂正正地挂在货架上。上款还有一首蝇头小楷写的诗：“文化珍宝百代兴，化作力量传贤孙，大众皆忧祖华艺，革命雄心意结坚，命运好来岁岁盛，好事迎门合家欣。”把六句诗的头一个字连起来，是“文化大革命好”，原来是首藏头诗。

《红太阳》音带转录了六七十年代流行的领袖颂歌，曾风靡一时。中央音乐学院新音乐团的二十世纪作品音乐会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竟是作于文革期间的弦乐钢琴伴唱《海港》。九三年是毛泽东诞生一百周年，“毛泽东像章热”再度兴起。

◎ 文革“图腾”成商品

在北京的旅游纪念品市场上，如今最走俏的是《毛主席语录》。香山、八达岭、颐和园附近的摊点上，摆放着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这些“小红书”身价大大超过寻常书籍，每本要价三、五十元人民币，个别珍本达数百元。

在北京的星期天“跳蚤”市场中，文革物品夺人眼目。六七年的一幅林彪锦缎像卖八百元人民币（约一百美元）。刊载江青拍摄的林彪学毛选彩照的《人民画报》七一年七、八期合刊卖五百元一本。上海、杭州也有类似的市场。

然而，文革中的“政治图腾”已失去了“法力”，变成可以买卖赚钱的普通商品。如果仅据此就认为文革回潮，认为“人们怀念毛泽东时代”，那是对文革的无知。

在北京，今年五月十六日像个普通日子，平平淡淡就过去了。忙于日常事物的人们，似乎忘了三十年前那个充满政治喧嚣的初夏。其实，经过十年波折的人，谁都会把磨不灭的回忆深藏心底。

在文革三十周年的日子里，七十七岁的原卫生部副部长谭云鹤和十一岁的孙子，一起翻看三十年前他挨批斗的照片。谭云鹤当年是中共黑龙江省委候补书记。

“那照片里你爷爷在干什么？”

“挨批斗呗。”

“爷爷低着头，颈脖上挂的牌子上面写着什么？”

“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反革命是坏人，修正了就变成好人了。”

“文革是什么意思？”

“文化大革命嘛。”

“它是好事还是坏事？”

“只要改革就是好事。”

谭云鹤听了，感慨万千。

对于文革后出生、长大的新一代中国人来说，文革中的一切都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议的。全国政协委员赵丽宏对一批青少年作过调查，发现年轻的军人有的不知道林彪是谁，年轻的工人有的不知道“牛棚”是派什么用的，大学生有的怎么也不相信曾有过“早请示，晚汇报”这种愚昧行为。

◎ 新一代对文革无知

老作家柯灵曾以自述文革遭遇的《回看血泪相和流》震撼读者的心。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年，历史脱了轨，中国发了疯。文革是人类文明的奇耻大辱，决不许重演，‘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曾被反复引用得老掉了牙，现在已经不大有人提了，但忘记历史，掩盖历史，终将受历史的惩罚。”

三十年前的五月十六日，一个有数千万党员的全球最大执政党听命于一人，通过了几乎导致“亡党亡国”的“五一六通知”。这样的悲剧在中国还会重演吗？

□ 原载香港《亚洲周刊》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输入：叶森树

~~~~~

【研究动态】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不能反思灾难的民族是无望的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和夫人高皋合著的《文革十年史》，是中国最早一部知识分子个人独立研究文革的著作。因八九年“六四”事件严家其夫妇流亡海外以后，摆脱了在中国大陆言论表达上的桎梏，通过重新充实改写并补充了大量的素材，使得《文革十年史》九十年代初在海外再版时的内容，比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增加了将近一倍。

夏威夷大学历史系郭颖颐教授，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将严家其夫妇修改后的《文革十年史》译成英文（书名《Turbulent Decade》），并且在他家人的帮助下，在尊重保全原著精神的前提下，制作了全书的索引，补充了大量注释。文化大革命至今已三十周年，四月中旬美国亚洲学会在夏威夷举行第四十八届年会，四月十日，严家其和高皋夫妇在被邀请参加亚洲学会（AAS）年会的同时，也出席了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举行的《文革十年史》英文版发行仪式。以下是笔者邀请该书作者和译者的一次三人对话。

时间：四月十三日晚

地点：夏威夷朋友家依山面海的阳台上

人物：高皋、严家其、郭颖颐和笔者

笔者：今天机会非常难得，在《文革十年史》英文版刚刚出版的时刻，您们三位作者和译者都碰到了一起。面临文革三十周年在美国出版这一本著作，想必有其特殊的意义，从您们作者、译者的角度看，还有什么在书上没有来得及写出来的话，需要补充的？

◎ 《文革十年史》是独立知识分子对历史的见证

郭颖颐：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在新加坡大学作访问，当时我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也是片段的，后来知道高皋、严家其他们写了这本书，他们以新的立场来写这本书，即以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来写这本书，根据他们自己的精力、自己到广场上收集的材料来写作，我觉得翻译这本书机会很好，也可以使我对文化大革命的了解更深入一点。后来经过朋友把书稿从北京弄到我手里来。

高皋：过去有人曾经说这本书有官方背景，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在写作过程中完全是作为一种业余的爱好来完成的，而且官方没有作任何的打扰，一直到这本书完成交稿，并由于出版中的一些问题，官方才知道这本书的出版。在中国这本书没有公开发行过，这是一本禁书，就是说整个写作过程都是我们独立完成的，从写作方法、表现形式，到一些资料的取舍，确实也带有我们一些主观的色彩。

郭颖颐：在注释方面我没有加那么多，否则会产生译者变成作者的趋向，所以我没有替你们原来的书增加注释，所应该指示读者解释的地方，我都放到后头索引里面去了，因为注释是原来研究的构造，你要把它补充、增加，会把自己变成另外一个作者。所以我在这个问题上斟酌了很久，要不要另外增加注释？译者所加入的注释都是在方括弧里面的，而现在这本书很少方括弧。但是，我的确在原有的注释中稍微整理了在英文中很不容易看的地方，象有些符号变成英文文化的东西，但没有惊动原来的结构，以至后面那么长的索引，这是后来加上去的，没有侵犯原书的构造，所以注释不敢认功劳。

笔者：《文革十年史》已经出版了中文版、日文版和英文版，相信对其他语种也有蛮大的影响，从写作该书至今，有好多年了，社会和您们个人的经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年又是文革三十周年，现在回过头去看，您们自己的想法是否也有

一些改变？

严家其：这本书主要没有讲很多评价，是用历史事实来说话的，所以这本书在这个意义上有长久性。它没有简单地对毛泽东、周恩来，或者是林彪等，用政治名词来说他是什么性质的人，而是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来叙述、描写文化革命的整个过程，以及这些政治人物的形象，这是这本书的一个特色。中国大陆出书一般政治性的断语说得比较多，这本书说得很少，但是可以看到作者的倾向性，对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和江青这些政治人物的评价都是通过事实来说的。

对于文化革命，今天的中国怎么了解它？对比文化大革命中的很多极端行为，今天中国可以看到走了一个相反的方向，没有文化革命的极端行为，今天中国不可能沿一个相反的道路发展。文化革命中间高度的计划经济，政治权力控制了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今天正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经济越来越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各种因素也在成长；文化革命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时代，却同历史上的专制有很大的区别，打着所谓“大民主”的形式，利用个人崇拜的方式，又可以揭露各级党和政府机关的各种阴暗面，所以文化革命是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我认为，要理解今天的中国这是一本很重要的书，对于了解今天中国，这本书仍有其价值。

#### ① 对资料的丰富收藏、把握和世界史的陪衬十分难得

高皋：这本书第一版史料方面，每一个地方都是有出处的，比如我曾经引用了刘少奇的子女怀念刘少奇的一篇文章，在我引用的时候尚未公开发表，是我通过各种途径从他子女手中要来的一个油印件，后来等它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时候，有些地方他们自己作了修订，我引用的与他们公开发表的就有一定的距离，第二版的时候我就按公开发表的作了修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另外，各人从不同的角度收集不同的资料，因为文化革命资料很多嘛，它也有各种误差，但不能说我从这儿找来的资料与那个不同就予以否认，在文化革命纷乱的派系很多的情况下，它都有不同的史料意义，应该在书中的注解中把它说清楚，比较准确地反映资料来源。

严家其：这本书的主要作者是高皋，原始资料的收集是在街上东一点西一点，逐步积累起来的。我刚开始也没有认识到文化革命史本身有这么重要，八十年代初期，我脑子里想的是自己能够评上副研究员，认为写文化革命史没有那么重要，当时我在着手写《首脑论》这本书，作为社会科学院评副研究员的成果。所以高皋是这本书的主要作者。但是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分析，同宗教改革比较，同法国大革命的比较，因为我对这些方面比较熟悉，所以我把这些加进去了。

#### ② 文革不能摧残基本的人性，这是历史与政治的聚汇点

笔者：郭教授谈到翻译文革史这本书，对文革史研究也是入门，可以是称作专家的时候了，从您现在的角度——一个美国华裔的历史学家，兼具历史距离的时空感——如何来看三十年前的文革？

郭颖颐：当然每一段历史，尤其是象文革这样性质的一段历史，同纳粹德国或法国大革命一样，我们搞历史的总是要问一个问题，它到底对那个国家的文化、民族有何影响？在这本书最后的结论中作者也提到这个观点，文化大革命会不会在某一方面永久地影响了中国民族彼此之间的信任。我记得这本书的结论中家其又说到，文化革命会再发生，假如我们不做某些事情。

严家其：郭教授，那句话是胡德平（胡耀邦儿子，现中共统战部局长）说的。



郭颖颐：那句话是非常有历史感的讲法，你不能完全说过去了就过去了，不会再生了；而是要警告将来一代，你要是不小心的话还会再发生。搞历史的人总会问，它是否使人的性格改变了？这个问题直到现在我们还得要问的。文化大革命说是十年，它影响了一代的精英、一代的普通人民，没有一个人在中国给逃过的，它耽搁了多少人的志愿，但是我们回顾文化大革命要非常小心，终身抱怨还是重新干过，重新干过是否意味着要忘记这个，如果不忘记怎么记住这个历史教训，这是非常要紧的。现在我们回顾的时候，仍旧可以看到现在中国社会一些文革的痕迹，但却仍不可以说它永久地摧残了中国的人性，要是说这样的话，表示我们自己对历史没有任何信心。即便是如此剧烈的一场运动，不能摧残基本的人性，这是历史与政治的聚汇点。我们写历史的、思考历史的，我觉得都应该立足在这一点上。

笔者：现在我们看到一种现象，对于文革三十年的纪念，是海外“热”国内“冷”，海外的“热”，当然这本《文革十年史》英文版的出版是标志之一，还有哈佛大学即将举办的纪念文革三十年研讨会，留美学者在国际电脑网络上建立了“电子文革博物馆”等；中国国内非但对巴金多年前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倡议一直置之不理，近年来更加紧了对这方面的控制，出版研究文革的著作、文革的研讨活动都受到比较多的抑制，反不如前几年开放。北京当局的这些做法显然与您们这本书的结论是有冲突的，胡德平认为现在不做这个研究，文革就可能重演，而中南海领导人显然不希望人们去做这样的研究，您们如何看纪念文革外面“热”里面“冷”的现象？

#### ◎ 阻止文革研究实际上是阻止中国政治民主化

严家其：那是胡德平一九八六年上海出席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时讲到的，那天正好是五月十六日，胡德平在与人聊天时谈到：二十年前的今天，正好是文革的开始，作为一个民族，如果不能总结历史教训，将是很不幸的；如果让文革再次发生的话，中国就将陷入无法挽救的灾难。我就将他的这个意思写到了不久后出版的一九八六年版《文革十年史》序言当中：“一个不能从灾难中总结并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整个写这本书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就是说要总结教训，郭教授讲得很好。为什么现在中国国内没有反思文革？讲“纪念”似乎不太准确。其实反思文革，涉及到一个“非毛化”问题，邓小平的政策是有限非毛化，而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全面的非毛化，当然毛泽东也有可肯定的地方，通过文化革命评价，对毛泽东整个历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历史，要有一个全面深刻的重新评价，中国才有进步的可能。实际上不进一步评价文革，就阻止了中国进一步总结毛泽东时代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邓小平对文革的基本评价是全面否定，简单的全面否定，依照我们的看法应该是基本否定，但不能是简单的否定，因为文化革命中间早期造反派，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并不是仅仅因毛泽东的号召，当然有个人崇拜的因素，另一方面共产党统治十七年，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掌权阶层同一般民众之间的矛盾，一直被反右、整风等政治运动掩盖掉了，毛泽东就是有这种胆略和魄力，为了反对他的政敌可以利用个人崇拜发动文化革命，在这个意义上对文化革命作简单否定是不行的。

文化革命有许多思潮，一方面是毛泽东高度的个人崇拜，一方面又冒出了各种各样自由化的思潮，对这些思潮这本书里有所发掘，作了相当完整的叙述，右边的、左边的、联动的、出身论的，包括李洪山的、伊林·涤西的、遇罗克的，都有很多记述。对文化革命的进一步研究，实际上可以促使中国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解放。简单否定，可以说就是为了巩固邓小平今天的权力服务的，巩固被打倒的邓小平、

彭真、杨尚昆，包括薄一波这些人的权力，他们愿意简单的否定。如果基本否定，而且重新发掘文化革命中造反派里面的合理因素的话，实际上会动摇他们今天的权力基础。一方面是限制全面的非毛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特别是邓小平重新掌权以后，除了反对“两个凡是”以外，而且同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关系，这样华国锋就失去了他的存在价值。

今天来看，包括对江青这样的人都需要重新加以研究，江青也不是一个简单人物，不是说是毛泽东的遗孀、或者说是“四人帮”就解决问题了，江青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非常值得深入研究。邓小平也是一个这样的人物，如果我们要进一步发掘文革的话，邓小平这么样一个被毛泽东称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怎么能够翻过身来，重新掌握中国的最高权力，对这样的过程，中国没有很好的发掘，这本书里面有所记述，但是进一步去研究这样一个过程，对认识中国政治制度里面的局限性都有好处。

阻止文化革命的研究，实际上是阻止中国进一步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原因。中国的民主政治化确实需要胡德平所说的，要总结经验教训，记述历史，而且要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今天中国最高层政治斗争的方式，同毛泽东之与刘少奇是完全没有区别的，第一把手同第二把手有很大矛盾，如果中国能够走出这个恶性循环，我想中国就有幸了。现在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同文化革命毛泽东建立的政治制度没有区别的，不过在方式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基本政治制度还是没有改变。所以总结文革经验，探讨文革发生的原因，特别是在政治制度上使中国实现民主化，实际上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中共当局这样做，至少是阻止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但是也不全是这样，因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围绕文化革命的研究，在今后中国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文革的研究还会在中国进一步发展。

郭颖颐：回顾文化大革命很重要，胡德平的话很重要，但是在课堂上我常问我的学生，你能把文化大革命往前推多少，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可以在中国历史上看见文化大革命的来临，那你就要考虑权力、思想、法律的各种平衡。在什么时代可以看得文化大革命的来临，这是另外一种历史看法，它们都往前推，文革以前“百花齐放”反右运动，以及好几次一松一紧的政治运动趋势，一直追溯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也是一种权力和思想的斗争，最后思想似乎都输给权力，文化革命是否就是那一种趋势的发展。这样一来，文化革命就不是十年啦，那当然是很清楚的，但要讲到前头后来的事情，往前可以推多久，往后可以推多久，这是一个历史家喜欢讨论的问题。

笔者：谢谢郭教授、严老师和高老师，难得幸会，非常谢谢。

□ 原载《民主中国》总三十四期

~~~~~

【自由论坛】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也谈“文革”

• 赵淮海 •

近读杨小凯君发表在《中国之春》第113期上的《再谈“文革”》（见本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之七”增刊第九十二期——编注）很有意思。可见杨小凯先生没有白经历文化革命，深具反思头脑。我对他文章的大部分内容不表反对，但他对西纠、联动的说法似不很准。比如他说西城区纠察队是杀人最凶的老红卫兵，联动有令人发指的杀人暴行，就与我当年的亲眼所见大不一样。

笔者是老红卫兵的一员，“红八月”时参加过“破四旧”。这是我平生所参与的一件缺德事，每念及深悔不已。在我甫离国门的当即，就把自己当年的经历写成交待、道歉文章，《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发表在《中国之春》第29期上。（见本刊“文革博物馆专集之六”增刊第八十七期——编注）如今看到杨小凯君的文章不禁又想起一些往事。

1.关于“破四旧”

老红卫兵当年第一个造反文献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平心而论，如果不计较其内容的正确与否，这《三论》确是气概非凡，简直不能相信出自一个高中学生之手。阿城先生曾说写文章凭的是一口气。气竭则文结。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高中生能养多长的气？一论就足以把气耗竭，他居然还能《再论》、《三论》。

北大附中红旗小组彭小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是第二个重要文献。“破四旧”这个术语就出自《毛主席给北大附中红旗小组彭小蒙的回信》。

1966年红八月抄家打人最凶的事是各校红卫兵自己组织，在公安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暗中指导下进行的。否则这帮中学生怎么可能知道谁家该抄，谁家不该抄。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已写在《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重读。

如果将来能找到给派出所下达暗中引导红卫兵抄家的指令存档文献，然后逐级上索到区公安分局，市局和公安部。到那时，才能查明把《毛主席给北大附中红旗小组彭小蒙的回信》里“破四旧”三个字转译成抄家打人，这么大运动过程的来龙去脉。

2.关于西纠

老红卫兵时代第三个重要文献是西纠的《九号通令》。由于破四旧造成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以西城区一批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暗中支持下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以图节制这种胡来。让周荣鑫给西纠财政支持和发汽车的人里有陈毅。陈毅对这种胡来简直是怒不可遏。他曾有言：“这种做法要让别人说我们共产党过河拆桥。”财政支持的目的是为了刹住破四旧，和杨小凯先生文中的说法似相径庭。

西纠的《九号通令》都是严令禁止非红五类子女参与抄家破四旧，以免造成更大的混乱；同时要求各校红卫兵按政策行事，节制自己。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有同时“不许黑五类报复”一类“拉偏架”的话。有个别西纠成员参与打人行是肯定的，但就总体上讲，西纠是节制红卫兵的组织。

由于西纠是保守节制的组织，在破四旧被制止住后，又成了中央文革希图借“群众造反运动”的力量冲垮他们党内对手时的障碍。所以在他们号召“群众”普遍参加“造反”时，为了把“走资派”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压下去，就拿西纠来开刀。因为当时各校老红卫兵都是各自为政的，并无全市统一组织。唯独西纠有后台。

西纠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后当然也“追查黑后台”。结果是周荣鑫下台代罚。

周恩来可谓官场老手，才华远非文革派所能比，事事设防于前。但他也不和文

革派正面冲突，一旦中央文革的“新政策”和自己的办法相左时，他不但绝不反对，而且听凭文革派的胡来。

周恩来曾召集西纠成员开会，要他们阻止方兴未艾的“大串联”，因为国家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和运输力量。但当西纠成员四出劝阻“大串联”时，江青等人又发话支持“大串联”，以便使造反的火种燎原。周恩来当即毫不脸红地掉转了话头，却把西纠给涮了一通。这和最后把西纠抛出来时，周恩来的撇清是一致的。

3.老红卫兵当初也不是铁板一块

最初的老红卫兵实际上有两个，各校都一样。一个是反性较强，既反校领导又反工作组的。清华附中写《三论》的老红卫兵就属此类。另一个则没多少反性，既不反校领导，也不反工作组。比如师大女附中宋彬彬所在的那个红卫兵就属此类。双方的观点和利害并不一致。反性较强的老红卫兵多是淘气调皮，有才气而又不受宠的干部子弟。没有反性的则多是以前得宠的学生干部。这两个老红卫兵组织在老红卫兵倒台之后已无观点和利害冲突，遂以响应“大联合”为借口，率先合并在一起。

说起来，笔者大概是第一个反西纠的人。西纠成立后给各中学红卫兵组织出身高级干部（少将，副部长以上）的头头四到八个西纠袖章和证件，算是西纠成员。由他们节制各自学校的红卫兵。我们学校的头头们自然又以此增加了一份在老红卫兵内部的优越感。他们阻止我们“大串联”，自己倒“大串联”了好几回。这些都令我们这些“红卫兵战士”看不过眼：“文革前你们就是受旧教育路线宠爱的班干部、团干部，有的还是学生党员。如今咸与造反了，你们怎么还骑在我们头上？！”我当时的心态和阿Q没什么两样。于是我找了一块一尺多长的红布，用黄色广告色在上边写上“纠察队”四个大字，编号第1001号。意思是说，你们西城区纠察队是“纠”红卫兵的，我这个“纠察队”是“纠”你们纠察队的。

我们几个红卫兵里的朋友轮流带着这个在当时举世最长大的袖章招摇过市，每每令人侧目，很是得意。

大约在毛主席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小将时，我们被分配到纪念碑南侧负责警戒，而无缘亲领伟大领袖的光辉。可是有西纠袖章的头头们却都跑到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上向万寿无疆的毛主席，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争宠献媚去了。如此不平等很令我们丧气。于是我在无数红卫兵组成的警戒线上公然佩戴上了“纠察队”的袖章，并立刻引起其他学校红卫兵的抗议和诘难，指责我们无组织、无纪律和“闹不团结”。我和他们辩论：“都咸与造反了，哪来的组织纪律和团结？”“咸与”二字他们听不懂，我也解释不清，所以辩论也没个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没多久我们借着中央文革的支持，登上了“大串联”的列车，一路游山玩水，毫无革命热情，连一份大字报也没抄下来。等天冷花光了从父母那里伸手要来的钱，回到北京时，所有的老红卫兵和西纠一起都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4.关于联动

老红卫兵倒了以后，几乎其中全部非干部子弟成员，主要是工人子弟，以及一些激情未衰的干部子弟又分别参加了四三派和四四派，“积极投身运动”。剩下顽固的老红卫兵就成了差不多清一色的干部子弟。笔者当时就属于顽固的老红卫兵。虽然在老红卫兵得意时我是反西纠的。但既然老红卫兵已经倒了，我却宁可守节，不肯再参加其他组织。

66年底到67年初，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没有一个组织自称保守派。抄平民家，殴打平民的事没有了。但抄前当权派的家和批斗殴打“走资派”的事却遍地开花，一发不可收拾。各造反派组织尚未重组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开展武斗。但我和我的“红卫兵战友”家无不被抄。

昨天“雄纠纠，气昂昂”的“红卫兵小将”，今天成了丧家之犬。昔日富丽堂皇的高级住宅，现在是一派轮番抄家后的狼籍。雪白的粉墙上涂满了打倒父母的斗大墨迹。有些人赖以自豪的父母已经悬梁、卧轨、服毒、跳楼、投河自尽了。这些当初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小将胸中的恶气可想而知。

眼见这些造反派的行为比自己当初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不如西纠更知道节制，于是在毛泽东生日的12月26日那天，这些老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了个大会，宣布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就是日后著名的“联动”。成立大会那天最后的节目是放映苏联卫国战争电影《区委书记》，其中有个誓词：“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可见联动的成立也有复仇情结，和杨小凯先生文章中说的造反派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一样。

同样的大会后来又在不同的地点开了几次。我参加了其中的大约两三次。会场毫无秩序，主席台上站满了人，谁都可以拿麦克风吼叫一气。有人带着鞭炮，到处乱放，不时全场大唱革命传统歌曲，一派乌烟瘴气。大会结束，这些情绪激昂的联动分子一哄而出，跨上自行车，号称“闹不灵大队”骑车游行，一路高呼“反动口号”：“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油炸江青！”。现在想起来虽然荒唐，但当时的气氛却颇为壮观热闹。

联动的行为很快引起普遍反感，随即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并抓了一些人。其中著名者有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于是这些“联动分子”又去冲公安部要求放人。

联动成立在老红卫兵倒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并没有如杨小凯先生说的那样组织过劳改营。联动其实既无什么组织形式，也没有证件，更不用报名登记。

从联动宣布成立到被宣布取缔的短短几十天里，他们的行动就是开大会，“闹不灵大队”的游行，“高呼反动口号”和冲公安部。虽然是乌合之众，我不敢保证他们没有过个别打人事件。但他们的矛头是直指中央文革的，并非再针对“黑五类”市民和造反派同学，也就基本没有红八月那样肆无忌惮的行凶胡来。

联动倒台后，一些人又组织了“老兵合唱团”，排练《红卫兵组歌》以示对旧日荣华的怀恋和对文化革命的反感。他们又被抓了起来。后来他们又被释放，并受到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人大大会堂的接见。接见当中他们则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毛主席诗词歌《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当面把个江青阿姨气得脸色铁青。从此以中共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彻底离开了中国政治舞台，让出地方来听凭分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去武斗。而饱尝暴起暴落经历的他们自己，则首创走后门当兵，寻求自己的发展去了，又开了风气之先。

漏网脱逃的“联动分子”兼“老兵合唱团”成员魏京生则去周游全国，目睹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落后，和自己的理想形成尖锐的冲突，成为日后中国民主运动的前驱。

联动所表现的不过是一种没落贵族的无奈。平心而论，联动本身并不是打砸抢，迫害人的刑事犯罪组织，而是反文革的政治组织，和西纠一样，都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但因其与红八月破四旧的红卫兵之间天然的联系，使得他们至今声

名狼籍。我想杨小凯当时的活动主要在湖南，而不是北京。关于西纠、联动的恶名声大多来自中央文革的公告和充满造反激情的社会传言，与实际情况有误。中国人舌头根子压得死人，唾沫星子淹得死人，对西纠、联动也不例外。

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老干部复出。有当年参与反中央文革的人提出给西纠、联动平反的问题。但终因红八月的名声不雅而被否决，以免再度引起社会反感。

5.关于“四四派”

四四派并非如杨小凯文章中所说是同情“联动”和“血统论”的。搞“血统论”的是老红卫兵。四四派也是要撇清的，并不同情联动。四四派的成员多是比较乖觉的好学生。其中不乏被整怕了的出身不好的人，特别是右派子女。

四四派比较温和，后来北京的中学“红代会”主要是他们掌权。四四派只出了一个名人，就是红代会的头子李冬民。他曾参加同时由蒯大富（清华）、韩爱晶（北航）、谭厚兰（师大）和王大宾（地院）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等到别人都下乡时李冬民去当兵。当大头兵当然比当红代会头子寡淡。于是他又跑回北京。可那时的中学生都“一锅端”下乡了，他成了个光杆司令。周恩来知道后又令其返回部队了事。

李冬民在“四人帮”倒台前还活动，被吴德抓了去。随着吴德、纪登奎等人的下台，李冬民又一次风风光光地出狱。

最近一次关于李冬民活动的报导，是他在91年苏联8·19政变时，带人到苏联大使馆示威游行，支持苏共中央的政变当局。显然他仍然不甘寂寞。

6.关于“四三派”

我所在的学校是个中等水平的学校。我们学校四三派武斗的凶悍比我们学校老红卫兵当初破四旧打人的名气大得多。他们的头子中很有几个是原来老红卫兵中“红五类”的工人子弟。他们在红八月时迫害同班同学，到社会上抄家打人照干不误。一旦老红卫兵倒了，他们又在校门口张贴一纸“起义声明”，就以此出名，成了四三派头子。这也可能和他们的出身气质有关。因为无产阶级最没有牵挂，反复无常最方便。

四三派最不能一概而论。好学校和中下等学校的四三派水平相差极大。那些好学校的四三派很有才气和豪情，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和高干的子女。“四三派宣言”就是这些好学校四三派起草的。好学校由于那些高干子女爸爸的官太大了，以至于部长级或三八式干部的子女都成了平民出身，加之和高密度知识分子子女之间的互相影响，他们反而更多加入四三派，更具自由派风格。

老红卫兵的最后余波是他们其中几个人办了一份《新莱茵报》。与其相对，四四派掌握的红代会则办了一份《兵团战报》。四三派的报纸是《中学红卫兵报》。三份红卫兵小报互唱对台戏。临近下乡，在三份小报几乎同时停刊之际，大家约定，二十年以后见，看到底是谁正确。可是还没等到二十年，大约在林彪事件后的一两年中，各方都有人被从插队的乡下抽调到省城工作。再次见面后略一深谈，却惊奇地发现，大家对当时中国局势的看法竟是大致相同。

7.中央文革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高手

四三、四四两派名称的由来，是源自中央文革里同样的几个人在四月三日和四日连续两天的两个内容相反的讲话。这两天的讲话造成北京中学红卫兵组织迅速重组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由此可见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段之高强。

在当年北京中学里的红卫兵组织中，老红卫兵和四三派的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四四派的实用主义色彩较浓。但不管哪一派，当年学校的录取分数线极大地影响着同一派内部的层次。各派头子只出于有数的几所学校，一个学校各派的头子有时只出在同一个班上。这些出于一班同学的各派头子之间倒不忘旧日的友谊，保持“费厄泼赖”和礼貌，但中下等学校各派之间却在那里互相“痛打落水狗”。

我之所以说老红卫兵是理想主义的，是因为他们相信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学说：穷人之所以受穷，是因为富人剥削他们。那么抄出富人家的财产分给穷人，问题就解决了。富人不愿意交出财产，只好用强。剥夺剥夺者，打抱不平，这就是理想。

阶级斗争理论造成民族内部极其惨烈的仇杀，既可悲，又可耻。为什么民族内部各阶级的生活资料来源就一定是剥削和剥夺，而不是创造呢？从小受到阶级斗争教育的老红卫兵也不知道，在斗争的战场之外，还存在着一个竞争的市场呢。

由于不管是哪一派的中学生后来大多都成了“知青”，鲜有人留在学校。再加上他们年龄小，后来又继续了八年的文革他们大多没有认真参加，而是身体力行，去重复魏京生的阅历，直接面对中国黑暗落后的现实去了。

8.老干部里也有理想主义者

文革结束后，中共老干部里还是有理想主义者的。

记得文革刚结束不久，我曾在朋友家见到一个他父母的老战友，从外地来京告状。我本以为是为自己“走资派”的冤案申诉呢。不料这个在抗战中受过重伤的老干部却极其愤慨地讲，他是来京告韦国清的。韦国清是杀人犯，在广西把造反派“四二二”杀惨了。

还有一次在另一处遇见一个四川来的干部。我因知道当时政治局委员李井泉的妻子和儿子都被造反派打死了，闲聊中说到四川人把李井泉一家害惨了。孰料那老干部却反过来说，李井泉在三年困难时期弄得四川百姓苦不堪言。下面向他报告，农民一天只有四两粮食了。他听罢不以为然地反驳：“四两粮食还不够？我一天也就只吃四两粮食。”那位老干部接着说：“他李井泉每天四两粮食之外，还有多少鸡鸭鱼肉呢！”

老干部们相信的理想是有毛病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工作。单凭“抓革命”是认真促不起生产的。威胁不如利诱。但理想本身的逻辑谬误并不排除相信者是理想主义者。由于中共组织法不凭考核政绩定赏罚，而是凭“靠拢组织”——“跟线”。直说了就是“跟人”拍马屁。所以提拔起来的多是唯唯诺诺或奸诈阴险之辈。真正理想主义的老干部不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掉，就是在文革后刚“解放”，恢复工作未几，就在第一轮劝说离休中又回家抱孙子去了。

如果老干部当中不是有大批理想主义者的存在，中共也不会轻易就打下天下；而如果今日中共干部队伍还有足够数量的理想主义者存在的话，它也不至于如此声名狼籍。

9.关于“五一六”

杨小凯先生文中提到了给五一六平反的事。真正的“五一六兵团”是几十名大中学生组织的反周恩来组织。是否有后台支持不得而知。我的一个朋友曾在上山下乡时遇见其中一名女成员，是个中学娄罗。问其为什么参加“五一六兵团”，答曰：“我们就是觉得周恩来有问题。”可见只有“五一六兵团”才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他们自己选择打倒对象，而不象在中南海门前长期静坐示威的“揪刘联络站”那样，按照中央文革的暗示，抢着给伟大领袖立头功。

这个女知青后来突然被上面来的一辆汽车带走，和其他五一六成员一样，从此失去踪迹。由此看来真正的五一六分子似乎没有后台，否则不会这么轻易地就被破获。但也说明周恩来的特工系统在当时是保持高度警惕的活跃状态。否则，在无数造反派组织中怎么能轻易发现这么个小小的“五一六兵团”？

大规模整肃五一六是师法南方根据地的抓A B团和陕北根据地的抓“红旗党”。其意是在找借口破除掉羽翼渐丰的造反派组织系统。整肃五一六诚如杨小凯君所言，是文革中迫害规模最大，拖得时间最长，致死人命最多的大冤案。责任主要在周恩来。但造反派也诚如杨小凯君所言，和所谓的保守派半斤八两，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如果给五一六冤案公开平反，就等于承认造反派那一半魔鬼行为是正确的。所以中共采取的办法是不给整个五一六冤案平反，但“解放”几乎所有涉嫌的五一六分子。其手法和处理西纠、联动一样。五一六并非唯一没有平反的冤案。

10.不同经历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文革从红八月开始打人，到各单位冲垮“走资派”后，军管终止了混乱状态，北京市共“非正常死亡”了四千人。我们学校在被破四旧时大约致死了四、五条人命，其中至少三人是自杀的。一个是从殴打他的楼上教室里跳下来摔死的。两个被我校红卫兵抄家的老夫妻，在红卫兵离去后悬梁自尽。我校学生数量相当多，红卫兵人数也相对多。如以我校为样本，则北京市共计大约一百所中学，致死大约五百条人命。即使将此数加番，估计北京市红八月致死人命一千条的话，则四千人减去一千，剩下的三千条人命是被后来各种造反派组织弄死的。

再说一遍：文革结束前，没人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后来誓不两立的两派都是造反派。“走资派”是逢单被激进的造反派拉去批斗，逢双被保守的造反派拉去批斗。杨小凯从造反派的角度看问题，分不清红八月打人的老红卫兵和西纠、联动的区别，也看不见走资派里的理想主义者。同样的道理，老红卫兵和走资派也分不清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区别。

记得“午门武斗事件”时，四四派在午门前开大会。我和几个朋友在场外看热闹。忽然见一队人马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裤，骑着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手持木棍、铁尺和用铁管斜锯成的扎枪，浩浩荡荡杀奔过来。一面黄色的四三派大旗迎风飞扬。这些人不顾阻拦，强行冲入会场，直向主席台扑去。最先抢上主席台的人里，分明就有我们学校声明背叛老红卫兵，而成为四三派头子的那位工人子弟。他们的表演比当初老红卫兵的丑恶不在话下。而旁边另一群身穿将校呢，足蹬将校靴，脚踏崭新全链套自行车的老红卫兵在那里起哄：“打得好，打得妙”，“四三派、四四派好好打呀！”一派幸灾乐祸。

在北京市中学生的老红卫兵、四三派和四四派三拨人里，只有老红卫兵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接受过控诉，做过检讨。其他两派则绝无此事。后来毛泽东、周恩来是用上山下乡的办法最后去除掉中学生里日臻成熟的组织。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天下已属刘”，这一点江青在文革开始时说得很清楚：刘少奇架空毛主席。

如果不论是非，只计成败，则高干子弟对冲垮旧校党委是有意义的。因为唯有他们才敢指着校党委书记的鼻子说：“我爸爸比你官大。”等他们发现自己带头冲杀的运动竟然打到了自己爹娘头上时，才觉得不对头。毛泽东和文革派适时地将他们抛出来，然后利用造反派来冲击掉旧党委的残余。等到利用完造反派以后再如法炮制，把造反派也抛弃掉，最后用安全可靠的保守派来重建绝对忠于自己的官僚系统。毛泽东在借谁打谁这一点上，堪称用兵大家，居然把兵法用到政治上来，方寸不乱，一点也不糊涂，只是心术太不正了。

11.上海是造反派掌权

有一个重要事实，杨小凯先生文中没有提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上海是真正由造反派掌权的。其他省市则是保守派掌权。上海造反派掌权是通过一场武斗获得的。造反派热衷武斗，保守派热衷整人。

文革中也只有上海还能保持生产不大幅度滑坡。但上海掌权的造反派搞生产也不外“抓革命，促生产”，并非真搞市场经济。正因为上海当权的造反派实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精神变物质的梦想，所以上海帮一直没有失宠。文革的结束自然以上海帮就擒为标志。

上海造反派虽然掌权了，但他们似乎并不同情其他省市的同行。江青就参与清查五一六。反而是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老走资派帮出面“解放”了五一六分子，虽然并没有彻底平反。

12.关于文革博物馆

杨小凯先生文中说，有人估计清查五一六一役致死“一二百万人”，这个数字很值得怀疑。

文革时，“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其中估计百分之二十城镇人口，城镇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是职工，职工中的百分之二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精英。清查五一六主要就集中在这部分精英人口中。

现在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有“五一六大本营”之称，全国清查五一六的规模无出其右，一共致死了几十人（见杨绛的《干校六记》）。学部十几个所，每个所几十名精英。如以学部一千个精英，总共致死二十人估计则是百分之二。用八亿人口为基数连乘三个百分之二十，再乘一个百分之二，得数是十二万八千人。即估计清查五一六致死十万人不是太离谱。

胡耀邦任组织部长负责平反时估计文革致死人命两百万。清查五一六只占其中百分之五。其他百分之九十五是在运动初期被打死和自杀的四类分子、右派、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结束后揭露出来的陈伯达下令整肃的辽宁叛徒集团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当然更多的人命是武斗打死的。著名的四平武斗、长春武斗使人想起辽沈战役。江西武斗使人想起五次围剿，还有四川武斗，内蒙的挖肃内人党，湖南、广西的大屠杀，云南的万人坑，宁夏荒野的累累白骨…，再加上遍布全国的武斗烈士陵园，这些事件造反派大多参加了。

造反派武斗的凶悍，保守派如果没有军队的开枪支援是抵挡不住的。保守派得势以后焉能不迫害造反派？当然在这些武斗中，造反派因为武器装备不行而最后失

败，死的人肯定比保守派多。

杨小凯先生文中有系统的迫害比分散无组织的暴力更凶残。但笔者这里的文革死亡数值估计得出的结论正相反：分散无组织的暴力比有系统的迫害凶残十八倍。学部李泽厚先生说“再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这个结论更接近于事实。今日民运不过是逼着这个比无政府要好的坏政府变得不那么坏而已。

笔者以为巴金先生的文革博物馆建议未尝不可。只要把准确的数字亮出来：老红卫兵破四旧致死多少人；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迫害死多少人；双方武斗打死多少人，等等。只要数字准确，就可以让后代自己去客观评价。博物馆大可不必预设结论。

13.关于“保守派”迫害“造反派”

事后所谓的保守派诚如杨小凯君言，是文革中有系统迫害他人的主要力量。他们从军队介入，支一派打一派，稳定住局势后，直到今天，始终占据着中国的政工系统。他们是“举起左手打倒走资派，举起右手打倒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可以挤出升迁的空缺，打倒造反派可以挤掉竞争的对手。他们的高超之处就在于至今使走资派痛恨造反派，使造反派痛恨走资派，而双方都不特别恨他们这些保守派。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和揪“三种人”时还是由他们来主持。

一个曾经被打成五一六的造反派对我说：“我们造反派就象太监一样。某朝大臣启奏，说宫内太监有净身不彻底者，秽乱宫闱；请皇上降旨，把所有的太监再重阉一遍。我们参加了一次造反挨了这么多年整，已经净过好几次身，阉过好几遍了。看来这回上面还嫌阉得不够干净，还得再阉一次。”其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14.关于“伸张正义”

文革中的中华民族丑陋无比，毫无正义可言。凡曾经有一天出风头机会得意过的人，没一个是正经好东西。上至伟大领袖，副统帅，中央文革的顾问、组长、副组长，红代会头子，下至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和所谓的保守派。没一人值得同情褒扬。

杨小凯先生主张象纽伦堡法庭那样伸张正义，不分派系地审判红卫兵、造反派和土改干部。这事我非常赞赏。但假设今天中国政府授与全权，请杨小凯先生按他自己提出的这个主张行事，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把这些迫害他人者从十一亿的人群里一个不剩地分辨出来，而又不冤枉一个无辜，避免制造新一轮的冤案。

笔者完全赞同杨小凯先生的主张，只是质疑技术方法。因为至今有人事档案经验的仍是保守派，连邓小平也拿他们没辙。

邓小平是最大的走资派之一，挨过好整。从个人恩怨上来说，他最应该恨这个迫害人的政工系统。但他也找不到同样庞大规模的一批有经验的人把现有的政工系统整个代替掉。如今他的大位已经坐稳，索性利用这个曾经迫害过他自己，但现在已经向他本人输诚的旧政工系统来为自己工作。

这里正说明中国政工这行的垄断是绝对的，绝对没有公务员中立。过去的冤案无法赔偿和伸张正义，今后的冤案也还会继续不断，充其量只是规模和残忍程度有所变化而已。希望在没有公务员中立的前提下消除冤案实属痴心妄想，哪一派上台都会毫无例外地迫害对方。

15.文革是社会精英的集体犯罪

据社会学系学生到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的结果发现，文革高潮时的刑事犯罪率最低，几近于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老红卫兵在破四旧时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过十万人批斗小流氓的大会。此事随即遭到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批评和讥笑：用十万人大会批斗小流氓，也太小题大作了。

之所以那时刑事犯罪率低到几乎零，是因为从老红卫兵开始的“革命行动”，到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批斗走资派，抄家，打人，武斗和私设公堂本身就是空前规模的刑事犯罪。而很有些经历过文革自由结社的人至今仍怀念当时的浪漫情调。

文革如果不是全民刑事犯罪的话，至少是全社会精英的集体犯罪，也就找不出一批自身干净的精英有资格开设“钮伦堡”法庭。

笔者对处理文革冤案的看法是：第一，不计派系地追究所有迫害致死的人命案，包括拷打致死和私设公堂逼死的。但武斗打死的不在其内：谁让你去武斗的呢。钮伦堡法庭也不审判战场上的德国国防军。这样牵连的面要小一些，而且定罪的技术要求也不高：你把别人弄死了，你就应该服刑，管你是哪一派的呢。第二，重价赔偿这些被难者遗属，买下他们的怨气。第三，中共就其故主席发动文革，擲全民族于仇杀血海的罪行公开道歉。

□ 原载《中国之春》一九九三年一月号，总 1 1 6 期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赵 桦（美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熊 波（美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代主编：[徐名扬（澳大利亚） <cnd-cord@cnd.org>](#)
《CND》总编：[温 冰（加拿大） <cnd-manager@cnd.org>](#)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 （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ftp://ftp.cnd.org)[132.249.229.100]：pub/hxwz

（加拿大读者可用：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hxwz）

考访服务站（Gopher）：cnd.org（中文或英文目录）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本期编辑用软件: XLBR2.0 ©严永欣 NJSTAR ©倪鸿波
GBLIST ©陈公权

本刊同时采用 ZWDOS ©魏亚桂 中文软件处理日常编务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XT